

# 三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纳日碧力戈<sup>1</sup> 左振廷<sup>2</sup>

(1. 内蒙古师范大学, 呼和浩特 010022; 2.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摘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历史传统、语言文化、政治制度三个维度着手。中国的历史因各民族共同书写而丰富多彩, 汉族的历史不全等于中华民族的历史, 少数民族的历史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们的语言文化因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而光辉灿烂, 从汉藏语系的多声调语言, 到阿尔泰语系的元音和谐语言, 从“汉字圈”到方块壮字, 从半坡遗址到河姆渡遗址, 从红山文化到良渚文化, 中国的语言文化自古呈现出满天星斗的壮丽景色和多元归一的大趋势。中国处理民族事务的政治制度因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本土实际相结合, 在实践中行之有效, 我国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平等联合的共和国。从名称上, 民族不分大小、不分“先进”与“落后”, 一律称为“民族”; 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大小民族要互相认同, 并且共同认同中华民族, 其中民心相通、互守尊严是铸牢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同时, 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伦理担当和美学感召不能缺场, 意志推动也很重要, 要保持希望的开放性, 把它持续投射到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创新认同之上, 转化为主动进取、奋勇前行、人心向善、爱家爱国的能动性, 所有这些都是民心相通、互守尊严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三维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尊严; 伦理; 美学; 意志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20) 01-0005-07

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20.01.001

新中国的中华民族由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组成, 他继承历史并多有创新。新中华不同于旧中华, 新中国不同于旧中国。新中国主动建构各民族共建的历史, 明确承认少数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主动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 明确承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是中华民族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中国在政治上承认少数民族,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建立各级民族自治地方。

## 铸牢历史传统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要从历史着眼, 如何写历史, 如何读历史, 如何释历史, 如何看待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政权, 这些都关系到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关系到为何构建和如何构建。

近代以来, 新兴民族主义奉行“弱肉强食”论, 追求一国一族, 影响深远, 挥之不去。英法

**【收稿日期】** 2019-10-16

**【作者简介】** 纳日碧力戈 (1957—), 男 (蒙古族), 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内蒙古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民族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从事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

左振廷 (1985—), 男, 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 博士, 贵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主要从事生态民族学、世界民族与民族问题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少数民族视域研究”(17ZDA152) 阶段性成果。

美起初要建立民族国家，路径虽然不同<sup>①</sup>，最终都选择了建立公民社会的道路，建成“多族共生”的现代国家<sup>②</sup>。中国虽然也是“多族共生”的国家，但历史背景与英美法有所不同。鸦片战争前后，一方面要接受外来进化思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达到“保种保国”的目的；另一方面要抵御外侮，抵制“奇技淫巧”，抵抗外来“邪说”，形成本土特色的文化民族主义<sup>③</sup>。同样，史家在撰写中国通史涉及少数民族的时候，会持有两种态度。一是把少数民族视为“入侵”的“野蛮人”，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把明朝和“中华民国”的建立称为“汉族光复”<sup>④</sup>；二是把中国的历史看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sup>[1]</sup>。例如认为元代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对促进多民族共同发展，对辽阔疆域的奠定，对中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和进步，都有巨大影响<sup>[2]</sup>。

这里涉及如何认识“中华”，即“中华”是否等于“汉”<sup>⑤</sup>？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主流话语把“中华”等同于“汉”，“汉化”即“华化”、“中国化”，这种话语比较典型地表现在对历史的认知中，如“康乾盛世”是满族汉化的结果？或是满族有效“团结”汉族和内亚诸族的结果<sup>⑥</sup>？抑或兼而有之？这里也涉及族群理论，柯娇燕等较早关注人类学的族群理论，指出传统汉学（中国学）概念（包括“汉化”概念）与现代族群概念格格不入，提倡对“种族”“族群”“民族”作纵向的历时研究，

强调近代（19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史研究引入“族群”理论的重要性和创新性<sup>[3]</sup>。从人类学的族群理论看，无论是情景论、象征论、边界论还是感情论，都比较注重人群的主观认同，把具体的“物件”和“质料”放到次要位置。大量的民族志研究告诉我们，语言、文化、人群、国家的边界很难一致。语言相通，文化不同；文化相同，人群不同；人群相同，国家不同。但是，人的心理认同可以超越表面的差异，做到重叠共识，民心相通，语言交流，文化共生。需要强调，心理认同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脱离物感物觉，不能“无中生有”，离不开外物拨动心弦的那一刻。人的心理认同能够反作用于现实生活，或者改造现实生活，或者寻找现实生活的另一种呈现，使之“形变”，实现情感交融和民心相通。心理认同和物感物觉互动互构，形成开放的“结构化”过程<sup>⑦</sup>。

铸牢共同体认同也涉及这样的结构化过程。首先，各民族彼此要有尊重之心、认同之意，尤其是大民族首先要认同小民族，小民族也要跟进认同大民族。需要呈现多族共建的中国历史，只要有愿望、有意志，符合这种愿望和意志的历史就会呈现出来。历史呈现并不一定需要编造，但一定需要有意识、有倾向地加以选择。认同有认同的语法，不认同有不认同的语法，不同的语法说出不同的句子，写出不同的篇章，造出不同的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铸牢多族共建的中国历史起步。从历史维度铸牢各民族

①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汉斯·科恩把英国、法国、荷兰、瑞士、美国及英联邦的民族主义称为公民民族主义（civil nationalism），这种民族主义建立在政治和理性之上。把中欧、东欧和亚洲的“神秘性”民族主义称为文化民族主义，政治和社会发展程度高的民族高居其他民族之上，族群边界和政治边界并不重合。中欧、东欧和亚洲属于农业社会，缺乏英法等国所拥有的中产阶级，保守的贵族阶层统治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层（John Hutchinson and Anthony D. Smith (eds.), *Nationalism*,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27) 安东尼·史密斯呼应汉斯·科恩，把民族形成的过程分为东方和西方两种类型。他把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瑞典和俄国归入“西方”，把中欧、东欧和中东归入“东方”。“西方”民族在领土、公民义务、法律条文等基础上形成，“领土民族主义（territorial nationalism）”是推动力，经历了社会-经济、军事管理、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三大转型”；“东方”民族在族群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其“三大转型”是后发的、滞后的，“族群民族主义”是动力。（Anthony D. Smith,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86, pp. 130-144）

② 英法美民族主义携带种族主义“基因”，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口诛笔伐”，甚至“武装干涉”，其效果不尽如人意，这种种族民族主义挥之不去，或死灰复燃，或从地下跳出，对市民社会的理想形成严重挑战。

③ 也可以称为“文化种族主义”。由于汉语“种族”概念和西语有差别，尚需跨语言分析和解释，故本文不作为严格的分析概念使用。

④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即旧历辛亥八月十九日，革命军起事于武昌……清人力尽势穷，遂不得不于其明年即“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退位。沦陷了二百六十八年的中华，至此光复……”吕思勉《中国通史》（标准读本）（Kindle 位置 7577-7586）。Kindle 版本，2019年。

⑤ 在英语里 Chinese 主要指“汉”，在俄语里 Kitai 指“汉”，亦指“中国”，蒙古国的蒙古语 Khitad 也是这样处理的。

⑥ “新清史”从边缘的观点看清史，从满洲和清朝的形成、八旗制度的内部结构和作用着眼，将清朝置于内亚的背景之下，突出可汗体制对清朝的影响。反对“新清史”的论者坚持满族汉化和民族融合对于清朝巩固和发展的关键作用。参见：刘凤云、刘文鹏《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上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⑦ 吉登斯的观点有说服力“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结构不是外在的形式，是内在于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因此“行动者在再生产结构性特征的同时，也在生产出促成这种行动的条件”。参见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9页、91页。

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民心相通、互守尊严的重要基础。

## 铸牢语言文化认同

铸牢各民族之间的语言文化认同，首先要从“互相”入手，即各民族互相认同对方文化，共同认同中华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共同组成中华民族文化。

新时代的中华民族有两个特点：多族共生，民族交融。中国有 55 个国家承认的少数民族，根据 2010 年第六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普查数据，人口达到千万以上的少数民族有四个，千万以下、5 百万以上的有 5 个，5 百万以下、百万以上的有 9 个，百万以下、十万以上的有 18 个，十万以下的有 19 个。语言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和窗口，是建立在本民族形、气、神互动互生基础之上的“展览馆”，也是呈现本民族民俗传统和生存智慧的“博物馆”。我国目前有 130 种语言<sup>[4]</sup>，55 个少数民族绝大部分使用本民族语言，而且有些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成员熟练掌握了全国通用语言普通话。与此同时，少数民族也通过普通话和本民族语言的双语学习，甚至外语的学习，扩大了视野，增加了知识，提高了交流能力。在我国保持自己语言的少数民族中，兼通本族语和普通话的双语人才很多，还有同时掌握普通话和其他少数民族语的多语人才。我国的绝大多数人讲汉语、习汉文。

在多民族地区用普通话讲民族团结的道理，讲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性，讲述多民族共建新中国的历史，讲述各民族文化的多彩与壮美，将更加便捷、更加通畅。同时，2018 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

纵观历史，汉语影响了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语言也影响了汉语。汉语使用者人口众多，其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影响力最大；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人口虽少，但历史也很长，文化也很灿烂，影响力在一定范围内也很大。《蒙古秘

史》是蒙汉文化交融的代表，“用四百五十多个汉字拼写蒙语而成”<sup>[5]22</sup>，不懂蒙古语看不懂，不懂汉字也看不懂；在元曲中汉族女孩叫“赛娘”，好医生叫“赛医”，“赛”即蒙古语的“好”<sup>[5]22</sup>。清代满族学习汉语汉文，也鼓励各民族之间互相学习语言文化，清政府为此编纂了多语对照词典，包括《五体清文鉴》《西域同文志》《四体合璧文鉴》《三合便览》《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音清鉴》等。蒙古语和汉语还有借来借去的“姻缘”。汉语的“博士”借入蒙古语读 bagshi，意思是“老师”，又返借给汉语，成为“把式”和“把戏”；汉语“太子”借入蒙古语读 taiji，指一种爵位，又返借给汉语，成为“台基”或“台吉”；汉语“夫人”借入蒙古语读 ujin，返借给汉语成为“兀真”，到满语那里转一圈，又成了“福晋”；汉语“百姓”借入蒙古语读 bansheng，指“土房子”或者“铺子”，返借给汉语成为“板升”或“板生”，又简化为“板”，如内蒙古地名“麻花板”、“古路板”、“攸攸板”、“塔布板”、“圪老板”、“厂汉板”等等<sup>[5]28</sup>。东北满族在元明时期借用汉语借词进行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使满语构词法由黏着型向汉语的孤立型转化，多音节和长音节的满语词向单音节和双音节的汉语构词靠拢，增加了元音和辅音，不再严格遵守“阿尔泰语系原有的元音和谐律”<sup>[6]</sup>。满语也影响了汉语北京话。作为普通话标准音的北京话，“是在北京京腔儿为基础的清代 mandarin（官话）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清初从东北入关的八旗兵民的满式汉语与明末北京汉人（含南京迁北京的说下江话的人和金元时期女真所留后裔，元代所称的汉人）汉语在乾隆末年北京内外城解体后相互融合的语言结晶”<sup>[6]200</sup>。例如，北京话里的满语词有“秃噜”（脱掉）、“妞妞”（女孩子）、“唠嗦”（话不歇状）、“邋遢”（迟钝、懒散）、“搭档”（窝棚、伙伴）、“撒目”（看见、扫视）、“白”（白白地、等闲）、“胳肢”或“格支”（腋下搔痒痒儿）、“掰扯”（查验、盘说）等等；北京话中的满汉合成词（括号里的字为汉语词或词素）有“巴（不）得”（极想捞着）、“恨（不）得”（极想让）、“轧（马路）”（在马路行走散步）、“母（们）”（我们）、“马虎（眼）”（鬼脸、假面具、使眼色打掩护）、

“(瞎) 掰” (瞎验查、瞎说) 等等; 北京话中的满汉并列互注词 (括号里的字是汉语词或词素) 有“(庄) 屯” (村庄、“档(案)” (个人或单位的履历文件)、“(哨) 卡” (边界哨所)、“(公子) 哥” (贵族家的少爷)、“猫(腻)” (隐藏)、“(末) 了” (最后、“轧伍(悠儿)” (慢走的样子)、“咋(呼)” (说话张扬、用词显摆)、“马猴儿(帽)” (冬帽子)<sup>[6]200-202</sup>。

中国自古有双语和多语交融并行的历史, 并且影响深远。从今天的语言格局看, 少数民族要掌握和利用好主流社会提供的各种优势资源, 就要学好用好作为全国通用语的普通话, 同时也要学好用好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教育或多语教育, 这既符合国情, 也符合本土需要。但人们在具体实践中的认识有所不同。一种观点认为, 随着时代进步与科技发展, 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功能降低了, 因此双语教育要以普通话为主, 目的是学好普通话, 精通普通话; 另一种观点认为, 民族语言仍然是少数民族的主要交流工具, 双语教育应该以民族语言为主, “主张每一个民族尽可能形成本民族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sup>[7]</sup>这两种观点各有偏颇之处, 需要折中一下, “既不盲目夸大, 也不主观降低……应该把民族语和汉语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确定正确的双语教育目的, 使少数民族学生成为既精通母语(文), 又能熟练使用汉语(文)的双语(文)者”<sup>[7]</sup>。

在当今中国这片土地上, 自古有不同的人群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 因地制宜, 发展出农耕、游牧、游耕、渔猎等不同的经济类型。

一般说来, 汉族最先开发了黄河流域的陕甘及中原地区, 东夷族最先开发了沿海, 苗、瑶、畲等族最先开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 藏族最先开发了西藏、青海, 彝族和西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南地区, 东胡各族最先开发了东北地区, 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蒙古各族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 回族和西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北地区, 黎族最先开发了海南岛, 高山族最先开发

了台湾<sup>[8]</sup>。

百越族和西南少数民族最先栽培稻谷, 少数民族较早栽培了棉花、甘蔗、茶树、漆树, 从古代西域传入中原的有高粱、玉米、棉花、芝麻、苜蓿、大蒜、葡萄、西瓜、黄瓜、胡萝卜。楚、越最早发明了水利灌溉, 秦代岭南骆越族开田灌溉, 汉代新疆形成了著名的“坎儿井”灌溉系统, 唐宋时期的乌白蛮会修建蓄水池和水利灌溉工程, 清代朝鲜族把水稻引入东北地区。塞北和西北的少数民族首先用驴、骡耕地, 汉唐少数民族地区畜牧业发达。少数民族还有发达的手工业, 制作精良的铜鼓、兵器、刺绣、毛毯、壮锦、侗锦、婆罗布、靛布, 茶马互市和马绢交易体现了少数民族和中原的依存关系。<sup>[8]15-16</sup> 中华文明对各民族的文化域外文化兼容并蓄, 在衣食住行上都有体现, 如胡服、旗袍、马褂、磨面制饼、葡萄酒和蒸馏酒、桌椅、胡床。<sup>[8]17</sup> 来自西域的音乐舞蹈和乐器也对中原有很大影响, 雕塑建筑、科学技术方面, 自古就有少数民族的贡献<sup>[8]18-19</sup>。

中国大地上的各民族语言和文化是新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汉族要认同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 少数民族也要认同汉族的语言和文化, 努力学好全国通用语言。

“两全其美”是解决少数民族双语问题的最佳模式。所谓“两全其美”, 指对待少数民族的双语既要保护他们的母语使用和发展, 又要帮助少数民族更好地学习、使用通用语……必须保证母语和通用语在现代化进程中分工互补、和谐发展。为此, 必须树立科学的双语观, 正确认识新时期少数民族语言功能的变化, 还必须科学地处理好社会语言生活、文化教育中母语和通用语的关系<sup>[9]</sup>。

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互相支撑、互相给力, 呈现“千灯互照, 光光交彻”的壮丽图景——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前提, 是不可动摇的历史答案, 也是毋庸置疑的基本事实。

## 铸牢政治制度认同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为实际服务的特点。首先,从名称上,民族不分大小、不分“先进”与“落后”,一律称为“民族”,而不是按照社会发展程度区分“民族”“部族”“部落”。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苏联专家叶菲莫夫在列宁格勒日丹诺夫大学作报告,他根据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认为,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中国(汉族)属于部族,不具备“民族”资格<sup>[12]</sup>。范文澜针锋相对,认为早在秦汉时代汉民族就形成了<sup>[12]1-16</sup>。李绍明解释说,“部族”是一个“落后的概念”,汉族不会接受,少数民族也不会接受,他们都愿意当“民族”<sup>[13]</sup>。当然,正如逯耀东指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泛论”,中国历史有特殊性,“很难完全符合”<sup>[14]</sup>。逯耀东还指出,当时参加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中方专家不能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文,依靠汉译,“不能顾及译文是否准确”<sup>[14]</sup>。中国特色就是在上述“正名”“感情”“实情”“译文”等层面的交汇处体现出来,所谓民族识别的“苏联模式”不过是“泛论”,具体的做法灵活变通,并不照搬,本土化、地方化更加重要。中国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实行苏联式的联邦制,而是实行符合本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绝非突发奇想,亦非朝三暮四,而是处于前后连贯的政治考量和逐步成形的制度设计。

这种政策在特定情况下和某个时间段内,也被落实到“白纸黑字”上。例如,1934年吴鹤龄根据汪兆铭的指示,代表蒙古盟旗起草蒙古自治办法,呈请蒋介石审阅,“蒋氏只在‘蒙古自治’四字之间,加上了‘地方’两字。这样就把蒙古自治变成了蒙古地方自治,也就是把这个问题当做‘地方自治’问题予以解决”<sup>[15]</sup>。

中国共产党早期,曾有过建立联邦制的设想,但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探索找到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1949年《共同纲领》明确提出了

“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聚居区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sup>[16]</sup>。李维汉向国家领导人说明,我国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而且相互交错杂居;我国没有经历民族分离,而是各民族在中央领导下建立了平等联合的共和国。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完成了从联邦制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转变<sup>[16]</sup>。

从1947年5月1日,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到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终于有了成熟的制度框架和法律保障,获得“不可动摇”“不容置疑”“不容削弱”的权威性。各民族互相认同、互守尊严要从认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做起,从互相认同政治权利做起,尤其从大民族认同小民族的政治权利做起<sup>①</sup>。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法制框架之下,只有互相尊重对方具有法律保障的政治权利,各民族才能更好地可持续认同多民族共建的历史,认同彼此的语言和文化,实现对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更高认同。

### 余论: 伦理·美学·意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和政治权利的正本清源,尚不足以铸牢共同体认同,还需要伦理担当、美学感召和意志推动。李泽厚提醒大家,哲学不仅包括认识论,也包括伦理学和美学<sup>[17]</sup>;皮尔士晚年说,逻辑学的基础是伦理学,伦理学的基础是美学<sup>[18]</sup>,美学是基础之基础。无可否认,我们对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和政治权利的认知与认同,肯定涉及伦理学和美学,也涉及“心想事成”的意志,伦理、美学、意志在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和政治权利的呈现中留下深深的印记。

人类学和民族学从开始就有为弱小群体担当

<sup>①</sup> 毛泽东在20世纪五十年代,就国内民族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断,其中包括“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民族人民的团结”,“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没有大汉族主义,那么,少数民族中间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是比较容易克服的”。参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6年2月27日),载《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卷第227页;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8-1069页。另参见郝维民《漫议中国西部大开发与蒙古族的发展——兼评少数民族群“去政治化”和民族“共治”》,中国蒙古史学会编《蒙古史研究》(第八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420页。

的一面<sup>①</sup>，例如摩尔根利用自己的律师身份为印第安人辩护，维护他们的权利，博厄斯和学生们用体质测量数据批判种族主义，列维-斯特劳斯为联合国撰写反种族主义宣言。这种伦理担当成为现代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主流，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同情弱者、帮助弱者、扶持弱者，而不是“遥看”“遥想”“遥控”。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掀起现代化浪潮，走上了“科技兴国”，“发展是硬道理”的道路。国家经过四十多年的飞速发展，政治和经济逐渐强大起来，费孝通晚年提出“人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提出了“文艺兴国”的构想，<sup>[19]</sup>中央目前也提出“美好生活”的目标。“科技兴国”需要“文艺兴国”来协调，在“科技兴国”之外还需要“美韵治国”，共同体的价值体系需要有美学要素，要有合辙押韵的旋律，要发出温暖人心的光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样需要合辙押韵

的旋律和温暖人心的光泽，要有节奏感，形成美韵。中国人讲“礼尚往来”，从昭君出塞到茶马互市，从彝海结盟到团结互助，尽显礼让中和。有美学感召力的和睦民族关系，不仅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更有利于加强各民族的共同体认同。

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詹姆士撰写《信仰的意志》一书，强调主动信仰的重要性<sup>[20]</sup>；恩斯特·布洛赫为希望人类学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sup>[21]</sup>，他不放弃“具体的乌托邦”（konkrete Utopie），寄希望于“尚未”，从物质的开放性看希望的开放性。可以把詹姆士和布洛赫的论点有条件、有修正地移植到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创新认同之上，帮助我们摆脱狭隘偏执的民族观，让它成为民族团结的强大意志推动力，成为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探方”，从而提升民众主动进取、奋勇前行、人心向善、爱家爱国的能动性。

#### [参考文献]

- [1]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一卷[M].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
- [2] 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
- [3] PAMELA KYLE CROSSLEY. 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J].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1( 0884-3236), 1990 ( 1): 1-34.
- [4] 孙宏开, 黄行.中国的语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0.
- [5] 李作南主编.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M].呼和浩特:内蒙古党校出版社,1991:15.
- [6] 赵杰, 田晓黎.语言人类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198.
- [7] 戴庆厦, 董艳.中国国情与双语教育[J].民族研究,1996 ( 1): 33-40.
- [8]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修订编辑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修订本) [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4-15.
- [9] 戴庆厦.解决少数民族双语问题的最佳模式——两全其美、和谐发展[N].贵州民族报,2017-05-16: C01.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
- [11] 曹锦清编选.孙中山文选·民权与国族[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248.
- [12] [苏]格·叶菲莫夫.论中国民族的形成[C]//历史研究编辑部.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57:228-254.
- [13] 李绍明.本土化的中国民族识别:李绍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讲座(一)[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 ( 12): 29-33.
- [14] 逮耀东.“汉民族形成问题”的问题[C]//台湾大学历史系.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1992:313-332.
- [15] 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M].李玉柱,李勤璞整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131.
- [16] 黄铸.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重大转变——从联邦制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 ( 4): 5-6.

① 当然也更多起到为殖民统治服务的实际作用。

- [17] 李泽厚.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C]//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0.
- [18] [美]约瑟夫·布伦特·皮尔士传(修订版)[M].邵强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7.
- [19] 方李莉.费孝通晚年思想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5:10.
- [20] WILLIAM JAMES. The Will to Believe and Other Essays in Popular Philosophy [M]. London ,Bombay , and Calcutta: Longmans , Green , and Co. 1912.
- [21] HIROKAZU MIYAZAKI. The Method of Hope: Anthropology , Philosophy , and Fijian Knowledge [M]. Stanford ,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金寿铁.希望的视域与意义——恩斯特·布洛赫哲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Three-dimensional Consolid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1.NARAN Bilik ,2. ZUO Zhen-ting**

( 1.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010022; 2.Fudan University ,200433)

**[Abstract]**To cultivat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needs to start from three dimensions: historical tradition , language and culture , and political system.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rich and long because of the diversity of writing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e history of the Han ethnic group is not completely equal to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 and the history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Our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creation of joint efforts of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 with diversity ranging from the multi-tone language of the Chinese-Tibetan language family to the vowel harmonious language of the Altai language family , from the " Chinese language circle" to the square character of Zhuang ethnic group , from the Banpo site to the Hemudu site , from Hongshan culture to Liangzhu culture.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has shown diversity and the general trend of pluralistic unification.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for handling ethnic affairs is effective because of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t ethnic theory and local reality. China has not experienced ethnic separation , but established an equal and united republic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arge and small ethnic groups both recognize each other as well as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whole , in which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are the key to shap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At the same time , in order to make a good sense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 ethical responsibility and aesthetic are indispensable. It is also very important to maintain an open mind ,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recognition of a Chinese nation from an innovative perspective in the new era , and to transform this into the entrepreneurship , loving both family and the country. All these are necessary components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Key words]**three-dimensional consolidation;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ethics; aesthetics; dedication

[责任编辑 红 梅]